

書海“第幾濤”？ ——中國人文學“數字化”詠歎調

黃維樑¹

摘 要：數千年前人類已有文字，已有資訊，已有書。當今是“數字化”資訊的時代。Digital：“第幾濤”？兩千多年前人類面對書海的“第一濤”，以色列的所羅門王和中國的莊子有類似的歎息：“知也無涯！”本文據科技進步劃分資訊發展的不同階段，所稱的書海第二、三、四濤，都有書數量的激增，有文化名人對書海浩瀚的感歎。本文把當前的數字化時代，定為書海激起的第五濤。千匯萬狀的資訊，無處不在，垂手可得；人文學者在文字的嘉年華中從事研究著述，可狂喜可極樂。卻也有苦有愁：做研究要廣集海量資料、竭力精研細判，勞苦而艱難；研究成果投入書海如一粟不起半點漣漪，為知音難覓而憂愁。人文學者在數字化時代生存，要自求多福：嚴肅認真守正工作，量力而為期盼創新有貢獻於學術；同時要看淡名利，知足常樂。

關鍵詞：人文學者；數字化時代；“書海”；人類資訊發展的階段

一、 兩千多年前書海“第一濤”

我們讀的書，書裏充滿文字，但不只是文字。圖書館有書也有圖，還有

¹黃維樑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文學博士，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；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客席副教授；台灣中山大學外文系客席教授；美國 Macalester College 英文系客席講座教授；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。

形形色色的音像資料。書，廣義的書，不限於僅由文字組成的資訊。狹義的由文字組成的書，其文字由古到今或刻在或寫在石頭上，甲骨上，竹簡木簡上，布帛上，貝葉上，羊皮紙上……然後在紙上。由文字（無論它是象形是拼音）組成的書愈來愈多，以至汗牛充棟，以至充滿了亞歷山大圖書館。人類歷史上早就有書的海洋，書的波濤一個接一個，愈來愈洶湧。

現在我們身處的是書——狹義的書和廣義的書——的數字化（digital）時代。Digital，書海的“第幾濤”？古埃及藏書豐富的亞歷山大圖書館，可能有以色列所羅門王所寫的《傳道書》，其作者曰：“著書多，沒有窮盡；讀書多，身體疲倦。”“亞圖”不可能藏有《莊子》，而遠在東亞的莊子，和同樣博學有智慧的所羅門王同聲歎息說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；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。”那些年（當然是歷時幾百年的那些年）荷馬編集的兩大史詩，不知已耗用了多少千張羊皮紙。印度的兩大史詩，大概也有文字傳播；不然，就有吟誦的聲波。兩千多年前，人類已受到文字書海第一波濤的衝擊。

西曆公元伊始，書海又一次揚波。我國的蔡倫（61-121）發明造紙術，司馬遷《史記》的傳抄，於是告別了木簡竹簡和布帛。慢慢地，基督教《聖經》的傳抄也有紙可用了。抄本多了，傳播快了遠了，人類的文字資訊遺產更豐富了，書海的大波浪再被激起，形成第二濤的衝擊。

二、“第三濤”：“文字！文字！文字！”

第三濤跟着來了。雕版印刷開始於7世紀的唐代，書多了，書價降了，使得並不富有的杜甫能夠“讀書破萬卷”。11世紀有了畢昇（972-1051）的活字印刷，15世紀有了古登堡（Gutenberg, 1398-1468）的活字印刷。印書由

興起到發展到壯大，這個持續七百年的大變局，使書海鼓起近乎海嘯的波濤。這第三濤激起的浪花，迷幻了中西資深讀書人老花的眼睛。歐陽修(1007-1072)這“文章太守”說道：你落筆千言，我“揮毫萬字”。他的眼睛看花了，看不了這麼多的文字。這麼多的文章這麼多的書，哪篇哪本能不朽呢？唉，都是“草木榮華之飄風，鳥獸佳音之過耳”！我們客觀地說，書有速朽的，也有慢朽甚至不朽的，歐陽修和晚輩蘇軾的文章，後來不是都載入18世紀編修出來的《四庫全書》了嗎？《四庫全書》共收3462種圖書，約八億個方塊字。莎士比亞(1564-1616)筆下有近似“讀書破萬卷”的好學之士，丹麥王子是其一，但他心煩意亂時發牢騷罵道：都是“文字！文字！文字！”

丹麥王子漢穆雷特來不及目睹工業革命（始於18世紀中葉）引起的書海第四濤。若看到，他必定在問自己“活着還是死去”時，還問“看書還是不看”？問着問着，他可能就被文字的大浪巨濤淹沒了。比大文豪莎士比亞年輕兩百多歲的小老弟狄更斯(1812-1870)，小說暢銷大西洋兩岸，他作品的單行本和連載他小說的雜誌，是從英國踏着海濤一箱箱運送到波士頓的。是海的書，這時代也是書的海。“文字！文字！文字！”《牛津英語詞典》(*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*)編修工作進行了數十年，從A到Z，完整的有125分冊的第一版，在1928年推出，所含文字的數量是漢穆雷特完全想像不到的。波濤翻滾，在書海字海上，人人可看、想看的文字絕對永遠看不完，已寫的文字難以找到讀者，更難找到知音。有讀者有知音，作者才死可瞑目，所以文學史地位和莎翁、狄翁不能相提並論的貝洛克(Hilaire Belloc, 1870-1953)這樣詠懷：“When I am dead, I hope it may be said: ‘His sins were

scarlet, but his books were read.’ ”（“當我死時，希望有人這樣說：‘他的罪孽無可救贖，但他的書有人誦讀。’ ”）

三、“第五濤”數字化時代人文學者的狂喜狂歡

20 世紀中葉電腦的崛起，讓人類在又喜又懼之中迎來書海的第五濤。說是後工業化時代，是信息（資訊）時代（information age），又說是數字化時代——這個名稱大概來源於美國學者尼格羅龐迪 1996 年出版的 *Being Digital*（中譯為《數字化生存》）一書。作者的姓氏 Negroponte 真有趣，意思是“黑色的橋”。文字和圖像等種種符號（sign）是用以溝通的，溝通為了瞭解、交流、融合，走的應該是光明大道，而這“橋”卻是黑色的。通道應該是光明的，光纖（optical fiber）啦，雲端（cloud）啦，可讓“易妙”（e-mail）通過的互聯網（internet）啦；然後是令人“愛瘋”的 iPhone 啦，率先使用 5G 技術的“華為”手機啦，伴隨智能手機而生的 WhatsApp 啦，微信啦……

發資訊，收資訊，數量高達千條萬條億條兆條，總之是天文數字或天文數字的多少次平方。面對數字化時代的各種各樣的書，面對天文數字的資訊，作為參與生產資訊和應用資訊的持份者，我們，尤其是身為人文學者的我們，至少可以發出兩個天問式的問題：“誰知其數？”“天極焉加？”（語見屈原《天問》）也就是問：有誰知道數字書海的數量？數字書海的極限設在哪裡？“黑色的橋”把人引進千種萬種億種兆種資訊的“黑洞”？

今天的中國人文學者，面對着數字書海，會感覺到這是個最好的時代，也是個最壞的時代。

各種各樣的資訊，點擊可得，仰觀宇宙之大，俯察品類之盛，遊目騁懷，極視聽之娛，超過王羲之的千倍萬倍。只就聽的“書”舉個例子。我們隨時可聽耳機的千曲萬曲，而兩百年前可憐的濟慈（John Keats, 1795-1821），貧乏得一聽到樹上夜鶯之“歌”就興奮快樂陶醉到要寫詩以記此美事。聽和視的資訊都從八方十六面，包括“一機在手，萬事開心”的手機微信朋友圈，排山倒海而來。

人文學者做研究，圖書館和個人書房的實體書，“谷歌”、“百度”網絡資料，WhatsApp、微信公眾號你傳我發的各式網文貼文，你想得到的都得到（這讓我想起《紐約時報》報頭的標語“All the news that is fit to print”即“一切新聞，應有盡有”），不想得到的更是超額“被得到”。一切該參考的古今中外文獻盡在你手中，資料極其豐富，取得資料極其便捷。5G時代各方湧來“無止（境）”的信息量。要編某專題的書目，要編某個作者的選集以至全集，就線上線下收集，雲端悉載，圖書滿館，不愁沒有資料而愁資料太多。這是個最好的時代，你所獲多不勝收、美不勝收，所獲可令你狂喜狂歡，時時刻刻都可以是資訊的嘉年華。

四、數字化時代人文學者的愁苦擔憂

這也是個最壞的時代——最少對我而言（應該也是對許多其他同行而言），壞在使我們苦，壞在使我們憂。勤奮的學者會極為辛苦。文論經典《文心雕龍·論說》指出，做研究必須“彌綸群言”即綜合組織可得到的各種資料各種言論，這樣研究後寫出來的文章，能“師心獨見”的，才是好論文。如今數字化資料極為豐富，假如你要認真而全面研究一本經典如《文心雕龍》，你可能要參考約兩個億的文字——根據戚良德《百年“龍學”探究》

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）的統計，龍學“有關著述已超過七百種、文章達到一萬篇、總字數約有兩億”。¹研究魯迅嗎？已有魯迅研究史一類的書出版過，而一本名為《魯迅手稿全集》的九大冊，近日轟然投進了“魯學”的書海。研究錢鍾書嗎？今年出版論述錢鍾書的專著至少有四五本，當然還有近年出版的《錢鍾書手稿集》中文筆記和外文筆記共七十多冊。龍學、魯學、錢學都是顯學，除上面所說的實體書之外，各個網絡平臺多的是新近的相關貼文，又是“文字！文字！文字！”。研究者不盡量閱讀理解消化“群言”，哪有可能推陳出新做到“師心獨見”。四五年前我讀到一個令人驚心的數字，中國最近有一年出版的人文學科新書數量達三十四萬種。

做研究，“讀書多，身體疲倦”，辛苦啊，“壓力山大”啊，可能過勞啊！今年11月11日《學人 Scholar》一網文稱，2017年5月4日英國《泰晤士高等教育》刊登文章，介紹瑞典一學者主持的一項研究，結論指出在世界各國中，中國學者所受的壓力最大。壓力來自多個方面，包括科研。當前中國有很多“世界第一”，我沒有統計資料，不過，中國近年每年出版的人文學術書籍數量，應該也是世界第一的。

研究極多，研究成果極豐富，評論研究成果者因此也極為吃力辛苦。書海裏這些文章，內容有“硬傷”嗎？有“軟傷”嗎？比起別的同類研究成果，這研究成果的表現如何？成就如何？可得到高評價嗎？即使評論者博學，析論和評價都是難事。如果評論者認真，那更要多方面考慮，要花時間踟躕斟酌，才可能有中肯或接近中肯的結論。

當今之世，不乏不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就作出評論的人。例如評論錢鍾書只羅列知識，只炫耀學問，說他不是思想家，沒有一家之言。又如批評夏

¹戚良德：《百年“龍學”探究》，第371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。

志清，說他揚張愛玲而抑魯迅，說他認為張愛玲比魯迅偉大。這些人或有“偏於憎愛”（《文心雕龍》勸人“不偏於憎愛”），或束書不觀遊談無根，或逞一時之快隨便月旦，所言都非的論。如果這等評論者有名氣，其評論極可能影響到不明就裏的一般人。不禁還要舉“偏於憎愛”的一個新近例子。有人把一國之人貶為“醜陋”，撰書鞭撻之；時移世易，作者親屬宣稱決定停止其書再印再發行，理由是當年作者憎恨某黨派，所謂“醜陋”指的只是那群人。當年眾多讀者接受甚至激賞其偏頗的“醜陋”說，就是缺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結果。

“讀書多，身體疲倦”。還有，也是上面引述過的，“著書多，沒有窮盡”。人文學科每個教授每個研究員都著書立說，許多人著作等身，這樣的書海，無邊無際，作者能找到多少細心的讀者？能遇到多少知音？這就是我所說的第二個壞處，即惹起學者“但傷知音稀”的擔憂情緒。很多不具盛名的學者，或者是非主流的學者，都有上面所說“貝洛克式”的焦慮不安，實例不勝枚舉。

五、人文學者解憂減愁之道

人文學者在數字化時代如何解憂減愁？請來杜康舉杯暫解之後，我認為學者的解憂之道，在於治學和著作態度的認真而量力；在於看淡名利、知足常樂——這些都是老生常談。

一切論說都應該建基於堅實的文獻，建基於慎思明辨，應該考察傳播中資訊有沒有被扭曲變形，即是《呂氏春秋·察傳》主張的那種態度。學者應量力而為，認識到集體研究的重要。撰寫文學史之類的文字工程，應該是集體的事，如朱壽桐之主編《漢語新文學通史》。（獨立修史而有可觀成績者

如古遠清，他始終是個“異數”；我一直想有機會比較深入地瞭解這位修史“健力士”的艱辛歷程。）

另一個解憂減愁之道，是學者盡量淡薄名利，知足常樂。名利之心人皆有之，嚴謹認真的學者不應以海量生產的作為，或以嘩眾取寵的手法，求取學術的功名。學者在時有驚濤駭浪的書海上，以平湖秋月的寧靜恬淡心情讀書，維持守正創新的治學態度，擇善而從，量力而為，以期對人文學的傳承和創新有或多或少的貢獻。知也無涯，書海第五濤的數字化時代，知比莊子時代是千倍萬倍的無涯，我們有涯之生，如此這般，也許可以活得苦樂參半，甚至多樂而少苦。